

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

——新世纪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

陆德明 张 伟

在新的世纪开始之际,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在思考本国、本地区在新世纪中的发展战略。中国中西部地区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面对这种严峻的发展态势,如何加速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遏止业已存在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并逐步缩小差距已成为西部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实际上,中西部大多数省区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都实行了资源开发导向型战略,以资源输出为其主要特征。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为依托的梯度发展模式收效不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尚不明显,目前更多表现为极化效应。显然,单纯依靠比较优势确立的发展战略在相当时间内难以达到赶超沿海发达地区的目标。它迫使我们思考在新的世纪中,落后地区应怎样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我们知道,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经济类型的定位和产业导向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认为,在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战略的前提下,中西部地区更应注重后发优势战略,形成“双重优势战略组合”。只有这样,才可能克服比较优势战略的不足,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缩小同东部地区的差距。国家目前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为这种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一、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李嘉图于1817年在其著名的关于酒和呢绒的生产例子中明确提出。依据该理论,各国应专业化地生产并出口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都会通过专业化生产和自由贸易获得比闭关锁国更多的利益,从而提高各自的福利水平。李嘉图的理论实际上说明在单一要素经济中,生产率的差异造成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决定了生产模式。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则进一步说明,一国在密集使用其相对丰富和廉价要素的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应专业生产并出口这类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了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以获得比较利益。

上述理论所涉及的虽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分工问题,但其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讨论中国地区间的分工与发展问题。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和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要素禀赋差异很大。如果以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几个重要指标的相对量来比较,大致都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东部地区由于发展较早,吸纳和积累了大量资本,近年来技术水平也在不断上升,东部汇集了中国大部分的技术和技术人才。这使得东部的资本和技术要素存量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由于东部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使劳动力资源的相对优势下降。对于东部而言,资本和技术是相对充裕的要素资源,而中西部(主要指中部和西南地区几个省份)拥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但资本、知识相对缺乏,劳动力是相对充裕要素,而西部地区大都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地区间的

要素禀赋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各地应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情况,建立和发展自己相对优势的产业模式,各地区之间在进行生产分工,而不是各地建成相似的产业结构,然后再借助地方保护主义来维持本地缺乏竞争力的产业。

比较优势战略一直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通过优势产业的发展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体制发育水平上的差距。我们知道,大部分国家经济格局都呈现由一个或几个主导地区的中心(或中心群)与一个处于依附地区的外围构成的等级结构。不管是城市、地区还是国家,中心是那里的经济“发展极”,它从外围取得资源,并向外围提供商品、劳务和市场。由于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水平提高,中心会扩张,其辐射外围随之扩大,形成梯度扩散格局。尽管这种扩张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会发生广泛的变化,但能动性强的中心与依附性强的外围之间有分工,是一种绝大部分国家经济普遍具有的特征。这种发展过程对一国财富和经济活动的分配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一是资源由外围流向中心的“极化效应”;二是财富和经济活动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扩散效应”。短期内,中心的极化效应往往会大于扩散效应,但长期来看,中心地区经济增长率会呈现递减趋势,经济活动地点分布逐渐向外围扩散,甚至形成经济增长中心的移动,导致外围地区经济发展不断加快,扩散效应最终大过极化效应,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利益的共享。从这种经济发展规律看,西部地区对于从东部转移出来的产业只要对生态平衡维持不构成威胁的条件下,应持积极的态度。对于分工层次问题,既然我们加入到国内的市场体系中来,就应该承认分工的存在,这也是比较优势战略的所要求的。西部地区有可能利用比较优势做大某一产业,甚至在全国市场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毕竟现实的是西部一落后地区,从全国统一市场体系来看,处于分工的较低层次,只要这种分工有利于经济发展,就应该接受它,并利用它。

一方面接受这种由于比较优势构成的分工,另一方面积极利用比较优势积极扶持自己的优势产业,这是比较优势战略的核心所在。落后国家或地区赶超先进国家或地区的方法并不在于要建成和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相似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模式。关键在于要找到一条能导致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模式。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不是在于产业模式与经济结构,而在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随经济发展水平而逐步进行的。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欧洲一些小国,如瑞士、芬兰等国只重点扶持几个有比较优势的项目,如银行、造船、旅游等,其产业模式并非是小而全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东部地区的增长产生的辐射效应有限,极化效应大过扩散效应,在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中部、西部地区的

大量资金、人才流往东部,这也是这一战略目前主要问题所在。西部地区有不少利用比较优势成功扶持和建成在全国颇有影响力产业的成功案例。我们以西部地区的云南省为例,以该省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烟草业和90年代的旅游业的发

展来说明比较优势战略的运用。从自然禀赋的角度看,云南的比较优势体现在资源、区位、气候等几个主要方面。资源优势包括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生物资源、能源和廉价劳动力等。如云南有相当多的矿产资源在全国占重要位置。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气候类型和特有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又形成了丰富而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使云南的烟草业具有天然禀赋的优势,这种比较优势长久以来并未得到发展。而自20世纪80年代后烟草业之所以能创造出连年的增长,市场占有率及经济效益大幅提高的结果,实际上是利用了“资源十市场十技术”这样一种方法,使具有比较优势的烟草原料生产在技术支持下持续不断地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品。云南的烟草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经验是十分珍贵的。如:“烟厂加基地带农户”的经营模式,它加速了农业产业化进程。这一经验在后来扶持花卉业发展时,演变为“公司十农户”的经营模式,非常有效。再如以市场为导向的“名牌战略”使云南卷烟工业得以强化科技手段,注重质量,带来较为稳定的市场和较好的经济效益。而烟草业的发展则带动一大批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烟草业成功的例证说明,具有的资源优势要转化为经济优势,还需大量相应的条件配合,包括像技术、资本、制度等。旅游业是利用这种战略获得成功的又一例证。旅游业近年发展迅速,1998年,旅游业创汇2.1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达到115亿人民币。和1978年相比,年均增长率达37.5%和118.82%。旅游业已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5%。而1999年借势举办当年世界博览会,云南省旅游业取得了更为迅速的发展。

实际上,西部地区各省区面临的发展难题是类似的,各省区都有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产业或条件,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利用,扩大这种比较优势,使之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究竟怎样利用已有的比较优势,西部地区实际上已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有成功的,也有收效不明显的。在把比较优势转变经济优势的过程中,有几点要加以重视:

首先,比较优势是动态和相对的。从开放经济的角度看,原有的比较优势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可能会不复存在。一个地区的优势有些是天然禀赋的,有些是后天努力获得的,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转换是可能的。

其次,比较优势的研究分析不能仅从资源出发,更重要的是以市场来定位,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来评价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与否及优势的大小。如大家一致看好的生物资源开发,这一优势发挥的好坏实际上取决于几项因素,这就是资本、技术、人才、营销手段和相应的制度安排。生物资源开发若没有这几项因素的参与,恐怕很难发挥出比较优势。甚至可以说,在这一产业中,资源本身的作用是次要的。

再次,优势具有综合性特征,经济优势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如一个地区在资源、廉价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会被信息、技术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劣势所弱化或抵消,结果很可能综合劣势大于综合优势。

最后,应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下来认识比较优势。大多数的经验和事实应已告诉我们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源利用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二、后发优势战略

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一般而言,由于经济

发展落后,会面临若干不利条件。但在已有先发国家或先发地区存在并示范的大环境中,不利条件会转化为有利条件。后发优势的内容一般主要包含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技术性后发优势,蕴藏在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的技术落差中,落差越大,势能越大。它表现为后发地区从先发地区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并经模仿、消化、吸收和改进提高所带来的利益。这些技术包括知识型技术、物化型技术及技能型技术等。随着学习的深入,技术差距逐步缩小,追赶式发展得以实现。制度性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地区向先发地区的制度学习,即效仿和借鉴各种先进制度并经本土化改进所产生的效益和益处。后发地区不仅技术落后,制度同样落后。与先发地区先进和较成熟的各种制度相比,后发地区经济制度效益低下,一旦进行改革,效率可大为提高。在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转型和变迁)的制度发展过程中,市场竞争制度的引进、企业制度的借鉴、经营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与经验教训等,这些方面对后发地区来说都存在着多种参照选择,蕴藏着巨大的后发优势。制度学习是制度变革的助推器和加速剂,技术学习与制度学习又是互动的,技术进步会引发制度学习,而制度革新又会激发新的技术进步。

实际上,后发优势战略就是通过学习过程来实现的。学习活动虽然要付出成本,但这种成本和创新成本相比是大大地降低了。由后发优势而促成的学习能低成本和短时间促使经济压缩性成长或追赶式发展。

利用后发优势成功地推进经济快速成长的案例很多。以国家为例,日本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学习型(模仿式创新)道路。1868年以来,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逐步改变其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1868年至20世纪初,日本通过引进学习仅用40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走完了工业革命的主要路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各种渠道、形式和手段,大面积、快速度地吸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最新科技成就,它用20多年的时间和60多亿美元,就引进消化了40多个国家在50多年时间里花费2000多亿美元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大量的后发利益。经济发展过程大大加快,现代化进程大为缩短。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它是先发地区(发达地区),但相对于海外,又是后发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利用其后发优势,大量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就初步发展起来了。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沿海先发地区相比,有相当差距。作为后发地区,它有其自身的后发优势。这主要表现为:

1. 政策性后发优势。尽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晚,水平低,但想要指望中央政府给予大量投入来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中央政府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目前已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就证明了这一点。西部地区已得到了中央政策的倾斜。同时,地方政府也可在自己权限内制定能与东部竞争的政策。

2. 改革开放的后发优势。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滞后于沿海地区,总体上是不利于发展的。但如果中西部地区策略得当,走学习型成长道路,全面借鉴沿海先发地区的经验,汲取其反面教训,则可能获得后发优势带来的后发利益。它首先表现为技术性后发利益,即沿海地区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夹带着外资、外技和先进的知识与经验等,中西部若能吸收利用,并结合本地丰富而廉价的资源优势,将形成巨大的生产力。其次是制度性后发利益。沿海先发地区的改革与创新,有不少值得学习、借鉴,并加以模仿。

后发优势战略的应用要求中西部地区能改变心态和观念,采取积极主动的相应策略。人力资源的开发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人力资源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后发优势战略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后发优势是相对落后在积极意义层面上的理解,因而它是潜在的,并非落后地区实际拥有的优势。后发优势是具体的、历史的,它只是为落后地区加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要使它成为现实,不仅取决于众多条件的支持,而且还取决于它与各种条件在不同时空范围的有效组合。由于后发利益的递减性,需要不断挖掘新的后发优势。否则有可能掉入“后发陷阱”,即陷入“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仿”的恶性循环中,长期依赖受制于外部世界。这时,只有进行学习型创新,即通过“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创新提高”才能爬出陷阱。

三、双重优势战略的组合

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单纯采用比较优势战略是不够的,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的重要理论前提是生产要素的天然禀赋。各地只能接受或固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分工格局,这样企业只能在其所处区域内去识别最佳产品生产,进行专业化分工而获得收益。但今天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于“创造性资源”(指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知识等非自然资源)。而这些“创造性资源”在国际间和地区间流动性极强,从而使生产要素禀赋限制减少,在扩大了的市场条件下,可以利用高技术的规模递增效应,利用异地的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

具体而言,中西部地区实施单一比较优势战略存在以下四方面的制约因素。

1. 缺少资本。绝大部分省区财政收支困难,经济规模偏小,人民生活贫困面大,社会发展水平低。这种情况导致资本积累较少,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较弱。

2. 缺技术。中西部地区科技发展虽然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但科技资源总量不足,总体水平低下,技术革新开发力量薄弱。

3. 缺人力资本(人才)。人才不足也是长期困扰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点之一。它表现为整体人口素质低下,受教育程度低;人才总量不足,人才的质量也不高。达到国内外学术和技术前沿水平的人才是凤毛麟角,融技术、管理、经营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缺乏。

4. 缺市场制度。首先是缺少完整的市场体系。现有的市场机制不完善,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市场发育程度低,各类市场间发展不平衡。另外,像市场争机制、政府调控方式这样一些制度性问题,仍处于探索过程中。

由于存在上述制约因素,实际上实行单一比较优势战略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即使可能在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取得突破,并形成优势,仍然难于改变经济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如果单纯服从按比较优势形成的分工格局,由于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的制约,处于低层的社会分工是获利最少的。且比较优势战略如果从静态的观点来看,它只关注短期利益,而难以判断按这种比较优势建立的产业的长期增长及生产率增长的前景如何。比较优势战略是落后地区的一项基本发展战略,但决不是唯一的发展战略。

另一种可行的发展战略是后发优势战略,其基本思路是通过由“模仿”到“创新”的学习过程来加速地区经济发展。当然单一的后发优势战略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一开始它受投资环境的制约。实际上学习型战略如果只是着眼于那些层次较高,且与当地要素禀赋不相匹配的产业,单纯仿效高增长地区产业模式必将导致地区经济同构。

较好的选择是将两种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形成“双重优势战略”。这种发展模式的好处在于两种战略互为补充,可相得益彰,达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

从各国发展经验看,落后国家或地区仅仅依靠比较优势达到经济发展目标的例子并不多见。相反,大多数获得成功的先例均是综合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而获得成功的。利用比较优势战略,落后地区可以较为容易地建立一批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达到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的目的。而利用后发优势战略,则可以跟踪先发地区经济发展的轨迹,迅速缩小与的技术与制度差异,进而可以重点发展一批具有长远利益,发展前景看好而在短期内比较优势并不太明显的产业。以此实现经济转型,迅速缩短同先发地区的差距。实际上它不是致力于要素禀赋不变和成本递增来利用比较优势,而是强调要素的流动性,可获得性以及基于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基础上成本下降的可能性,通过学习、引进和交换来创造比较优势。日本及许多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都是这样做的。

比较优势战略着眼于在社会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建立和自己资源匹配的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而后发优势战略的着眼点在于引进学习,通过模仿和创新来实现追赶,后来居上。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西部地区既有比较优势,又有后发优势,具有实施双重战略的可能与条件。基本的发展思路应是以比较优势原则,建立和巩固一批优势产业,如云南省的烟草业、旅游业、矿业等,形成特色经济。同时利用后发优势战略,缩短在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市场制度等方面与先发地区的差距。它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比较优势战略实施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它能先导性地建立一些具有长远利益的新产业,如信息产业。以后发优势带动比较优势,超脱传统比较优势的束缚,形成一种动态的比较优势,使产业结构具有自己特色又可以不断地向上升级。这样才是缩短与沿海地区差距,实行追赶战略达到后来居上目标的发展之路。

实施双重优势战略,特别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着力改善投资环境。这方面的讨论与建议已比较多,这里不再多论,但要注意的是改善环境的核心是制度建设与方法的掌握。

2. 技术与制度的学习与创新。人力资源的积累和开发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技术的学习与创新。人力资本和技术要能发挥其作用,前提是要有合适的制度安排。要记住的是技术和制度具有互动关系。

3. 政府角色的正确定位。在双重战略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大。政府的政策选择会直接影响到生产要素的流向与分配,产业培植需要政府的帮助,落后地区的企业也需要政府适度的保护,市场制度的形成需要政府的推动。政府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政府怎样掌握好这种干预的度,否则其负效应会大于正效应。

发展战略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与发展的速度。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没有一种现成的发展模式是可以为落后地区直接拿来套用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和选择一定要和本地区的实践相结合。其成功实施也取决于系列因素的配合,如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市场组织等。西部地区有着其特有的优势,很有希望在新世纪的发展竞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曾国安)